

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

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新编

第六册

冯友兰

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新编

ZHONG GUO ZHEXUESHI XINBIAN

第六册

冯友兰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53,000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100

ISBN 7-01-000393-9/B·87 定价 5.90元

第六册 自 序

本书第四册和第五册的自序中，我提出了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几点意见，现在将要出版的第六册是自觉地照着那些意见写作的。在实践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的那几点意见基本上还是不错的，但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

在第五册序文中我说：“每一个时代思潮都有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成为讨论的中心。”我的哲学史工作向来是注重于对于狭义的哲学问题的讨论。在三十年代，我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出版时，我就自己说，我的书是哲学多而历史少。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一番辩论。有的人认为，哲学史不应该限于狭义的哲学。有人说，应该限于狭义的哲学，如果不是如此，那就是学术史或思想史了。当时确有些人把他们的类似哲学史的著作称为学术史或思想史。现在这本《新编》第六册没有指出什么真正的哲学问题是这个时代思潮所讨论的中心。这一册《新编》看起来好象是一部政治社会思想史，这种情况是有的，但这不是由于我的作风改变，而是由于时代不同了。

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的第二次大转变，这个转变比第一次大转变更剧烈，更迅速，范围也更广大，这是一次东西文化全面斗争，其范围牵涉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其结果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在这个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投身于思考这个问题、参加这个斗争的实际行动中。每一个大思想家同时也是

一个政治社会活动家，他们都是一派政治社会活动的领袖，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就是这个时代思潮的中心。要想在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之外另找一个纯哲学的中心问题，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在实践的过程中，我又有了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一点意见，写哲学史要通过复杂繁乱的事实看出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脉络，透过现象见本质，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所谓“史识”，这是历史学家的最主要的才能。要想达到这两个目的，得到这个才能，有个方法，那就是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

中国维新时代的主题是向西方学习，进步的人们都向西方学习，但不能倒过来说，凡向西方学习的都是进步的人们。这要具体地分析，要看他要学习的是什么。中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在和这个缺点的斗争中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全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是我对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它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大贡献。

我的这个看法和时贤的看法正相反对，他们会说这是为曾国藩翻案。但我不是为翻案而翻案，故意标新立异，这是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的结果。

阻止中国的中世纪化，这是曾国藩的大功，他也有大过，那就是他开创并推行了以政带工的方针政策。西方国家的近代化走的是以商带工的道路，这是一个国家从封建进入近代化的自然道路。

曾国藩违反了这个自然道路，因而延缓了中国的近代化，这是他的洋务派思想，详在书中。总起来说，曾国藩的功是阻止中国中世纪化，他的过是延缓中国的近代化，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宇宙间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事物是一好百好，一坏百坏的，历史家的任务是说明其功过的内容及其所以致此的原因，这也就是对具体的事物做具体的分析。

涂又光同志帮助我写作曾国藩一章，通读了卷帙浩繁的曾国藩全集，提供了许多材料。关于满汉斗争的三个阶段的提法，也是涂又光同志提出的。

在这一册的写作中，张跃同志始终帮助我工作，他也提了不少宝贵的意见，朱伯昆同志读了稿子中的几章，提了宝贵意见，乘此册出版之际，我向他们致谢。

冯友兰

1988年3月

DG/10/07

目 录

第六册 自序	1
第六册 绪论	1
第六十章 中国历史第二次大转变时期思想界中的 先行者——黄宗羲	11
第一节 《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	11
第二节 对于罗钦顺的评论	13
第三节 对于心学的修正	19
第四节 《明夷待访录》所画的蓝图	21
第六十一章 颜元对于道学的批判	26
第一节 颜元的《四存编》	26
第二节 颜元对于“格物致知”的新解释	29
第三节 颜元对于“格物致知”新解释的历史意义	31
附 记	33
第六十二章 戴震反道学的斗争	34
第一节 戴震论“道”	34
第二节 戴震论“形上”、“形下”	36
第三节 戴震论“理”	37
第四节 戴震论“性”、“气”	38
第五节 戴震论“欲”、“情”、“知”	40
第六节 戴震对于道学的政治的批判	44

第六十三章	魏源应付大转变的新形势的总对策及其哲学思想	46
第一节	魏源的总对策	46
第二节	魏源的“经世”精神	49
第三节	魏源的哲学思想	51
第四节	魏源“以夷为师”思想的影响及其局限性	54
第六十四章	农民大起义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	56
第一节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情况	56
第二节	洪秀全传略	58
第三节	洪秀全的宗教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	59
第四节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作用	61
第五节	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	65
第六节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	67
第七节	总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	69
第六十五章	所谓“同治中兴”和“同治维新”的中心人物——曾国藩	73
第一节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	73
第二节	曾国藩的哲学思想	76
第三节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	80
第四节	曾国藩的洋务措施和洋务派思想	85
第五节	曾国藩与满汉斗争	91
第六十六章	戊戌变法(所谓“光绪维新”)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康有为	96
第一节	康有为的生平和著作	96
第二节	康有为早期变法思想	97
第三节	康有为所领导的“公车上书”	98

第四节	康有为对变法“统筹全局”	100
第五节	康有为所理解的君主立宪制	102
第六节	康有为的重商思想	105
第七节	康有为的《官制议》	107
第八节	康有为与今文经学	109
第九节	康有为与孔教	114
第十节	康有为的《大同书》和他的哲学思想	119
第十一节	近代维新时期的“格义”	124
第六十七章	戊戌维新运动的激进理论家和哲学家	
	——谭嗣同	126
第一节	谭嗣同对于封建制度和道德的批判	127
第二节	谭嗣同论“仁”和“以太”	130
第三节	谭嗣同对于事物发展的了解和认识过程的分析	138
第四节	谭嗣同的道器说和三世说	142
第五节	谭嗣同对戊戌变法的说明和辩解	146
第六十八章	中国第一个真正了解西方文化	
	的思想家——严复	151
第一节	严复对于当时所谓中学和西学的“格义”	152
第二节	严复对于当时中国的问题的看法	156
第三节	严复所介绍的《天演论》	162
第四节	严复论“自由”	166
第五节	严复与逻辑学	168
第六节	严复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170
第七节	严复的哲学思想	173
第六十九章	中国近代美学的奠基人——王国维	177
第一节	王国维对于康德的推崇	178
第二节	王国维的《论性》	180

第三节 王国维的《释理》·····	182
第四节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183
第五节 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	189
第六节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191
附 记·····	199
第七十章 关于中学、西学斗争的官方结论 ·····	202

第六册 绪 论

中国的近代史是从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这个近代并不是专就时间说的。本书第一册的《序言》中说，中国历史有两个社会大转变时期：第一个大转变时期是春秋战国；第二次大转变时期是近代。1840 年是第二次大转变时期的开始。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所谓四民：士、农、工、商。这个次序是按照他们的社会地位排列的，士的社会地位最高，被称为“四民之首”，商的地位最低。

封建社会的政治是地主阶级专政，其中有直接参加国家机器的，这是地主阶级的当权派；有不直接参加国家机器的，这是地主阶级的不当权派。士是知识分子，介乎当权派和不当权派之间。他们还没有直接掌握国家机器，但经过国家的选拔，取得了可以直接参加国家机器的资格。所以他们虽然仍为四民之一，但是居于“四民之首”。

士的家庭出身绝大多数是地主阶级。一般的地主阶级也自称为农，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地主阶级确实是在农业生产上参加了分配这一环节。在封建社会中，一般地主阶级都自称为“耕读传家”，“耕”指他们也是农，“读”指他们也是士。因为农也包括地主阶级，所以在四民之中地位排在第二。

至于工、商就不同了，他们和地主阶级毫无联系。在封建社会中，工被称为手艺人，言其是专靠手艺吃饭的，完全是体力劳动者。

商被称为买卖人，言其专以买卖为生。商人买东西是为了卖，卖东西是为了买，在一买一卖之间，商人在价格的差别上赚了钱。所赚的钱，就是他的本钱所得的利息，钱在他们的手中会生利，所以又被称为生意人。

在封建社会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最低，但专政的地主阶级所最怕的是商人，因为他们的阶级本能使他们觉得商人是他们在政治上的潜在敌人。因为商人有可能积聚财力、人力以夺取他们的政权，又引诱农民弃农经商，和他们争夺劳动力。在西汉的时候，举行过一次盐铁会议，关于这些问题有很激烈的讨论（参看本书第三册第三十章）。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的政权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中，当时的思想家们都发出类似的言论。

在南宋时期，沿海一带对外贸易很活跃，商人的地位提高了，陈亮、叶适等功利派也发出了重商的言论。到了明朝，李贽等人也发出了类似的言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动摇的信息。

工商开始翻身了。这个时候的工还不过是手工业者，还是手艺人，这个时候的商还不过是贩卖货物的商人，还是买卖人，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了，他们活跃起来了，他们从社会的最下层爬上来，成为市民了。市民是资产阶级的前身，但还不是资产阶级。不过，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那就不是原来的封建社会了，所以称之为半封建社会。如果由此再进一步，商人有了更大的资本，直接经营手工业作坊，直接生产他们所需要卖出的商品，合工、商为一体，这就是产业资本家了。如果再进一步，利用产业革命的成果，以蒸气机为动力，召集成千上万的工人制造面向全国和全世界的商品，那就是近代的资本家，真正的资产阶级了。中国的市民阶级如果有机会自由发展下去，也会成为真正的

资产阶级，中国的封建社会也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可惜没有这个机会。

资本家和商人虽有不同，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商人靠买卖商品之间的价格上的差别得到利润，资本家靠制造和出售商品之间价格的不同得到利润。资本家在制造商品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原料资源，一方面需要销售商品的市场。一国的资本家工厂越办越大，往往需要全国的资源以为原料，需要全国的消费者以为市场。工厂再大资本家就要越过国界，以全世界的资源为其原料，全世界的消费者以为市场。如果别的国家不吃这一套，资本家就使他们的政府用武力打开门户。这样，使用武力的国家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所压迫的对象就是殖民地。中国的资本主义刚露萌芽中国就已经成为殖民地了，不过还不是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没有象非洲那样被瓜分，而是成为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公共殖民地，所以被称为半殖民地。当非洲被瓜分的时候，中国也曾惊慌了一阵，但不久就过去了，终于停留在半殖民地的地位。美国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就是维持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地位。

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任何一个封建的国家或社会，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都会自然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各社会的历史条件不同，各封建社会的发展有迟速的不同，所以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有先后。

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中国又落后了一步。为什么落后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样大的历史变化必定有很多的原因，绝不是用一个原因可以说明的。儒家思想的统治是其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地理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从地理方面看，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大陆国家，虽然海岸线很长，但内陆的地面更广，沿海地区的进步比内地的进步快得多，到现在还是这样。沿海

地区，如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是不是可以撇开内陆地区先行快跑呢？不行。因为在政治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把地方管住了，使沿海与内陆不能有很大的差别。内陆拖住了沿海的后腿。西方有一句成语说：“一个舰队的速度，决定于其中最慢的船。”一个舰队的司令不能使慢船开快，只能使快船开慢，慢船拖住了快船的后腿。

统一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欧洲的历史中也有几次统一，但没有巩固下来，至今还保持着象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割据的局面。现在的欧洲人想组织一个象美洲合众国那样的一个欧洲合众国，以便欧洲在世界政治中有发言的资格。他们搞了几十年，才搞成了一个欧洲共同体，距欧洲合众国的理想相差很远。中国从秦汉统一以来，中间也经过几次分裂，但大体上保持着统一，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统治全国。到了明清两代，中央政府的权力尤为强大。统一是好事，有时也是坏事。中国沾统一的光，有时也吃统一的亏。上边所说的拖后腿的情况，就是吃亏的一个例子。

在中国近代史中，中国这个社会有两种势力，一个是自发地进入资本主义的势力，即半封建势力，一个是外来的帝国主义势力。后者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压力迫害前者，使其不能发展；前者极力反抗这种压迫，在挣扎中前进。这是中国近代社会这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这两个对立面的斗争就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同志和共产党的理论家们断言中国近代社会就其性质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断言是科学的，合乎历史实际的。这个断言已经是家喻户晓、人人赞同的了。人们虽然都赞同这个论断，但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个观念的理解却不完全

相同。

如果把我所了解的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和那个论断联系起来,我认为半封建是指中国社会内自发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半殖民地指外来的帝国主义的束缚。

半封建是对于全封建而言的。半封建本来不是一个有贬意的名称。它是一个由封建社会转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所蕴育的一个胎儿。如果能够自然发展,中国的封建社会也会生出资产阶级的。可惜这个胎儿还未出娘胎,就被帝国主义扼杀了,于是中国就沦为半殖民地。半殖民地是一个完全贬意的名称,半封建则不然。半封建对于全封建说也是一个进步,其所以含有贬意,是因为中国社会停留在半封建,其所以停留在半封建,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我没有专门研究过中国经济史,不能指出中国在什么时候发生了资本家和产业工人那样的雇佣关系,也不能指出在什么时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达到全社会总生产的百分之五十。作为一部哲学史,本书也不需要举出这些事实的细节。我所强调的是上边所说的那种趋势。其所以强调这种趋势,是要说明中国社会如果能够自然地发展下去,也会进入资本主义。我反对有些人对于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的错误了解。有些人认为,在这个地位中的中国社会好比一个西瓜,一刀分为两半,一半是封建,一半是殖民地。这种了解不但误解了半封建,也误解了半殖民地。半殖民地是对于全殖民地而言,近代中国虽然已经成了殖民地,但还不是某一个帝国主义单独霸占的殖民地,所以称为半殖民地。1937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就是要使中国成为它独霸的殖民地。如果中国抗战不成功,中国就成了日本独占的殖民地了。

我也反对又一种说法,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有刺

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照这种说法，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中国就不能出现资本主义。实际的情况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是在和外国资本的斗争中兴起的。中国社会并不是因为有外国资本的侵略而才有民族资本家，而是虽然有外国的经济侵略而民族资本家还能挣扎出来。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都是用通商的形式进行的，这就是在近代维新时期先进的中国人们所谓的“商战”。早在 1896 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就说：“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他的这几句话揭发了帝国主义以通商为名，剥削殖民地人民的实质，也指出了受剥削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惨命运，极其深刻，也极其沉痛。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对于“灭国以商”这个道理还不是人人都清楚，康有为不愧为当时中国的先进人们的领袖人物。

康有为及其集团所代表的正是我所说的半封建势力，慈禧太后及其集团所代表的是全封建势力。戊戌变法失败了，全封建势力暂时压倒了半封建势力，但并未扭转历史潮流的趋势。这是不可能扭转的。好比海边上的潮水，一阵波浪退下去了，接着来的又是一阵更大的波浪。每经一次进退，潮水的水位就升高一级。全封建势力暂时占优势以后不久，更大的一次波浪又来了，这次波浪不但冲击了全封建势力，也冲击了半封建势力。辛亥革命前夕有一次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大论战，在这次论战中全封建势力已经不在话下，不成为冲击对象了，冲击的主要对象是代表半封建势力的立宪派。立宪派斗争的对象已经不是全封建势力，而是革命势力了。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维新就转化为守旧了，康有为也从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转化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所谓半封建也从褒意转化为贬意。人们不禁诧异，康有为怎么变了。其实康有为并没有变，他的

思想没有变，他的言论行动也没有变。不是康有为变了，而是时代变了。时代变了而他没有变，所以他就落后了，落伍了。落后者，落于时代之后；落伍者，落于先进人物之伍。康有为对此没有自觉，一直落下去，一直到民国成立了，他还是想方设法企图使清朝的小皇帝复辟，以至于在他的晚年一举一动都成为笑柄。所以有一个讽刺的对联说：“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

康有为由先进转化为落后的过程，就是半封建这个名词由褒意转化为贬意的过程。

上面所说的偏重于理论，所引的事实不过是作为一个例子。下面再转回到具体的历史。无论怎样，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大门终于被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打开了。中国一向闭关自守，关起门来坐在家里妄自尊大，自居为“天朝”，认为没有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的人都是“夷”（野蛮人）。但是在现实面前，“天朝”对于外来的侵略竟然毫无抵抗之力。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夺取香港，得到了一个根据地，把住了广州门户。此后，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打入中国，以武力强迫清政府增加通商口岸，从上海一直开发到中国的内地，长江上游的重庆。所谓通商，就是允许他们用低价购买中国的资源，运回他们本国，在工厂中加工为成品，然后把成品运回中国，以高价出售，在价格的一高一低之间获得暴利。这就是使中国永远成为他们的工业原料来源地和成品推销的市场，这也就使中国永远成为他们的殖民地。

“天朝”和“夷”的地位竟然倒置了，这使当时的中国人大惊不已，也大惑不解，不知道事情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在无情的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总结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总结就是“以夷为师”，“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个总结大家都承认了，但什么是